

近代军阀鼻祖

—— 曾国藩

点评：

曾国藩青年时代志向远大，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深山的巨材抛出天外，用为国家栋梁，并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发愤读书，精心研究为官之道，总结出了一套局面做大居官不败之法，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先是攀附权贵穆彰阿，得以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当上二品京官；接着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操办团练疯狂残杀会党群众，得了“剃头”、“屠户”的绰号。同时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纽带组建湘军，成为中国近代军阀鼻祖；继而锁定目标，矢志不移，屡败屡战，最终攻克天京，挽救晚清江山于既倒。一介书生由此一跃而成“中兴名臣”，被誉为“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

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则说曾国藩“足以成为我们的老师”。

曾国藩究竟是怎样的人？何以能够成就大事？他死去百多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有关他的故事、传说、传记、日记、书信、家书、著述铺天盖地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 本文将帮助你解开这个世纪之谜……

年少勤学 获取功名入翰林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这是青年毛泽东对晚清名臣曾国藩的评价。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乳名宽一，号涤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村子坐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嵎山下，离湘乡县城一百二十里（今属双峰县）。白杨坪一带是丘陵山区，山青水绿，林茂竹长，风景十分秀丽，只是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曾国藩在一首诗中说，“恨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就是追述他幼时生活的环境。

曾氏祖籍衡阳，清初迁于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1808）他的祖父又把家迁到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兄弟三人，排行居长，老二早殇，老三曾骥云无男，以兄子曾国华为继子。曾国藩一姊、三妹、四弟，共兄弟姊妹九人。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签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只有兄弟姊妹八人，以曾国葆最小，曾国藩称其为季弟。

曾氏迁于湘乡之初，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字元吉）一代，才渐渐富裕起来。据曾国藩说，曾应贞年轻

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积聚了价值数千金的产业，盖起几处宅院。曾应贞年老时，除留下衡阳境内的四十亩养老地和一处宅院外，其余全部分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因为曾家的剥削生活是从曾应贞开始的，所以湘乡曾氏的族谱亦从他序起。传至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一代，曾应贞其他支脉的子孙已大多衰落，惟独曾国藩一家日渐富裕，成为一个据有百余亩土地的地主。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个颇善于经营的乡下财主，曾家的产业在他手上得到很大发展。曾玉屏年少时游惰不事生产，经常骑着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或相逐于闹市，或日高酣睡。后接受别人的劝诫，卖掉马匹，徒步回家，从此终生未明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他家当时有一部分梯田，垅峻如梯，田小如瓦，耕作起来很不方便。他带领长工凿石开壤，日夜苦干，终于把小块梯田开挖填补成大块平整土地。为了增加农作物的收获，他精心研究节令与种植的关系；为了提高剥削量，他亲自督率长工耕田种菜、养鱼喂猪，彼此杂作，无稍空闲。曾家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对雇工的剥削（后者是主要的，前者数量有限）积聚起一份财产，并使之逐步增多。后来曾国藩把这套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接待亲族邻里，早即早起，扫即勤扫屋宇庭院，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这八个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乡下土财主的生活。

曾国藩为官以前，他的家庭大约仅达到中小地主的水平，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富农的特点。据他自己说，他的祖父、祖母和母亲，都一直没有脱离辅助性劳动，自己小时候也干过一些放牛、砍柴之类零活，但没有参加过主要劳动；甚至曾国藩做了两

江总督之后，他还时常令女儿和儿媳每人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查她们的女工。他与曾国荃同时封爵之后，又特地写信嘱咐在家掌管曾氏家政的四弟曾国潢说：“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 我家仍靠作田为业 不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以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这些情况都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曾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及其对曾国藩的影响。

曾玉屏不仅是个生财有道的财主，同时也是个武断乡曲的小土棍。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村里人无不畏惧。邻里间发生什么纠纷，曾玉屏常常居间排解，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往往使一些性情倔强的当事人神气沮丧，就此罢休，甚至还要携樽登门道歉，方可了结。曾玉屏在家里更是个专制暴君。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对家人动辄责骂，无人敢于流露出丝毫不耐烦的表示。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虐事夫子，卑拙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求得曾玉屏的谅解和欢心。

曾氏先祖虽有过粗识文字之人，但并无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玉屏幼时本来是有条件读书的，但由于他放荡游惰，不以读书为意，所以早年弃学，文化程度不高。后来他成为乡里的头面人物，遇事又喜欢跑在人前指划，因而深感没有功名的缺憾，决心让自己的子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以跻人士绅的行列。他教督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砺 期于有成”。但曾麟书很蠢笨，十六次院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四十三岁那年才考取一个秀才，仅比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玉屏深恨其不争气，常常加以不堪忍受的责骂。曾麟书亦自知才短，无望仕进，遂“发愤教督诸子”，将

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他为了教会自己的儿子，不惜一切努力，使尽了各种办法。曾国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辙乃已。”

曾国藩对他祖父很崇拜，他认为曾玉屏的威仪、言论雄伟非常，他与曾国荃虽然位至督抚，但其威重智略远不如曾玉屏，只是由于没有机会，才使他祖父终老山林，而未能一展其志。曾国藩说，他祖父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还说，他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曾玉屏的言谈笑貌、一举一动，无不对年轻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经营产业的殚思力行、训斥曾麟书时的专横刚愎，以及父祖两代功名心之急切，都深深地印在曾国藩年轻的心灵上，不仅成为他当时发愤攻读、追逐名位的动力，而且成为他后来政治生涯中坚忍精神和顽强意志的思想渊源，他后来常说的所谓“挺经”，主要就是从他祖父那里来的。

曾国藩六岁上学，七岁起开始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塾中学习。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并对他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训练。这个时期，曾国藩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曾国藩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在少年时期已小有才名。相传十四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到家塾中访友，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大加赞赏。曾麟书亦有意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请命题试之。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喜，认为前程无量，遂将自己的女儿许与曾国藩为妻，此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曾国藩跟着他父亲学习了十余年，自二十岁那年起开始到外

地上学。先是求学于衡阳唐氏家塾和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后，又入湖南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欧阳厚钧。欧阳厚钧字福田，号坦斋，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年逾四十而以母老告归，主讲岳麓书院前后达二十七年，弟子著名者有三千人。正是在这里，曾国藩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大约一年左右，道光十四年肄业之后，随即考取湖南乡试举人。这年年底曾国藩开始从家中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但是，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和第二年的恩科他都没有考中，只好南归返乡。曾国藩此次进京，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留京期间他曾精心阅读了韩愈的古文和一些经史书，返乡途中又用借贷和典当衣物的钱在江宁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曾麟书对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但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这几句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从此闭门不出，在家发愤苦读了一年。后来，还把他父亲的这几句话写在日记上，为自己限定进度，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从而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一月庶吉士散馆，列第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活。

效法先贤 修身养性致力理学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功名心是很盛的。他的好友刘蓉说他“锐志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相传曾国藩成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以此又羞又愤，“即日买车欲归”。由于劳崇光已授官翰林院编修，有名公卿间，多方劝慰，坚留不已，并答应为他帮忙，才使曾国藩回心转意，按时参加了朝考。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深山的巨材抛出天外，闻于当今天子，用为国家栋梁，并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齷齪，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讲得更为直率，称“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尔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清王朝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

秩序的地主阶级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这就是他的门待所说的“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

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不摇，奋发努力，他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治学，广为涉猎，进行了巨大的努力。道光二十至二十七年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这两个部门并无具体事情可做，是供官员们读书养望的地方。曾国藩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游，精心研究了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镇压人民革命的经验，不仅为当时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从军从政准备了条件。

曾国藩治学是从道光二十年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开始的。当时的所谓学术，既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科，也无其他学派中的地位，实际上只有儒学一家。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内部派系的兴衰变迁，及至道光中期，主要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及今文经学五个学科或门派。

鸦片战争的发生给当时的士人以极大的震动，堂堂天朝大国，竟惨败于“岛夷”小国手下，惨败之余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使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为半独立国。于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光转而对外，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求强国御侮之策。他们一面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了解外国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面要求对照外国改造中国自身，提出学习西方某些制度，对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行改革的主张。与鸦片战争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作为地方大

吏的陶澎，既手握重权，又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所以，思想上的认识可以立刻化为行动，并取得成效；而鸦片战争后的魏源等人，只是一些幕僚与学者，因而，他们的认识和主张十几年间一直停留在思想上，保存在著作中。虽然如此，但却使风气发生改变，广大士人渐以经世致用为尚，不再以闭门治学为荣，形成新的习尚，一时风靡全国。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当时还不甚了解，因而在治学方向和内容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后来他在回忆自己治古文辞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

其归。”又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氏后人姚永璞也说，“昔永璞先考慕庭府君尝言，吾师戴存庄孝廉入都，曾文正询古文法，存庄以《惜抱轩尺牍》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通过这一时期的钻研，曾国藩不仅加深了对古文的兴趣，初步摸到做文章的诀窍，也受到桐城派思想观点的影响，把“文”提到与“道”相埒的地位。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姚鼐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千万言不能休，别立帜志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学，以为不足复存，其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当然，曾国藩所说的“诵其文，承用其说”的“近世学子”包括自己在内。不过，这一阶段曾国藩主要是自学，既无老师指教，也没有朋友与他一起切磋琢

磨，学术上进展不快。更重要的是，由于曾国藩名利心切，学无专精，随着时间与兴趣的转移，治学方向与内容亦不断改变。他在交往中发现，梅曾亮、何绍基已经走在他的前面，在古文这个领域里自己很难超越同辈，一举成名，所以便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后来他对这一转变自我解释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但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又怎样读书呢？当时曾国藩仍是心中无数。于是便专拣名人著作阅读，自觉不自觉地转到治理学的道路上。

曾国藩治理学是首先从阅读《朱子全集》开始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本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朱子全集》（又称《朱子全书》），回家后便随即阅读起来为了弄清治学门径，三天后又去向他的同乡长辈唐鉴登门求教。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闽洛”，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因而曾国藩慕名投拜，向他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并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经济之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经世致

用之学的简称，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经济一词的含义不同。在此之前，曾国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目光被限制在应制时文（即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内。做官之后，他虽曾摸索过做古文和诗词的方法，但终属支离破碎，对学术问题和治学方法缺乏系统了解与基本知识，因而对唐鉴的话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有顿开茅塞、一新耳目之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还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回忆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讲得更为详尽：“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窃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可见唐鉴等人对他鼓舞之大、影响之深。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开始的。本来，在上年夏天唐鉴向他传授“读书之法”时，同时也谈到了“检身之要”，要他“熟读”《朱子全书》，即以为课程。并举倭仁的例子说，“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但曾国藩并没有完全照办，尽管每天专心阅读《朱子全集》，却并未作修身札记，也未做静坐功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几功夫最要紧”。倭仁所说的“几”，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苗头，所谓“研几”就是抓住这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其“克己之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封建圣道的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封建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且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回去之后，曾国藩就按倭仁的要求写修身日记。他每天静坐半个时辰，写下自己各种不合封建圣道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充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倭仁的眉批无非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开始曾国藩对“静坐思”很不适应，每静坐未久辄昏然睡去，及离梦境，已半天过去。对此，他总是又气又恼而无可奈何，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痛骂一顿，第二天再重新开始，直到十几天之后才慢慢习惯起来。

然而，他这样搞了两个多月就变了主意。原来曾国藩本来体质孱弱，由于每天搞得太紧张，不久就得了失眠症，整日无精打采。勉强又坚持了二十来天，突发吐血之症。从此身体虚弱，心情不畅，再也不想刻苦修行、做一个专治理学的学问家了。他在病后不久写信对他弟弟们说：“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日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是不是曾国藩改变了对理学的看法，从此之后不再搞理学了呢？不是。他在同一封信中对他弟弟们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低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

义理者也。”还说：“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可见曾国藩并无轻视理学、弃置不问之意。他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亦并无怀疑，其读书方法也仍然坚持唐鉴的说法。他的转变主要是在治学内容上改变了理学与古文的主次地位。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曾国藩就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并初步摸到一点做文章的门道，养成了对古文的浓厚兴趣。所以，虽然唐鉴告诉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而他仍不能忘情。他在给刘蓉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可见他这时的做法是主攻理学，兼治古文，虽整日忙于读书、写字、静坐、写心得，仍没有放弃对古文的研究。

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和实践，他发现理学家的这一套治学和修身办法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遂改弦更张，将研究理学的目标仅限于领会其精神实质，即所谓“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不再盲目仿效别人搞什么静坐自省、修身日记之类，其治学内容也改为主攻古文，兼治理学。一年后，他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余近来读书无所得”；“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数月之后又更为自信地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可见他这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钻研古文诗词上，并略有进展，颇为得意，但并没有放松对理学的学习和个人修养的要求，不过改变了办法而已。同时，他治理学也不再限于阅读程朱的著作，开始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书，并对它们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末及其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考据学仍抱轻视态度，

把它当成细枝末节，明确表示“考据之学吾无取焉”。

曾国藩学习文字训诂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事。这年九月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去段玉裁所注《说文解字》一部，随手翻阅。当时汉阳刘传莹也住在这里。刘传莹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便向他请教。刘传莹也正为考据学“无当于身心”的修养而感到苦恼，遂向曾国藩学习理学。于是二人经常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遂成好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受益甚大，不仅使他由此懂得了考据学，弥补了学识上的缺欠，而且使他进一步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祖，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而“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同时，在治学上曾国藩也不再独宗程朱，而是由程朱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他说：“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而自己治学则‘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以上这两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曾国藩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思想。这是曾国藩治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飞跃，对当时学识的增长和以后在学术上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然而，曾国藩却没有成为一位学问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全国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专门研究学问了。后来他回顾自己的京师生活时说，本来想多读些书，与梅曾亮、何绍基诸名士一比高低，“无何，学未成而官已

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就是说，他没有搞多久，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就已升为二品高官。从此天天忙于公事，便把做学问的事丢到脑后，无缘过问了。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向唐鉴、倭仁、刘传莹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治理学者，惟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所以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他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攀附权贵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顺利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

“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

的这种手法。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多年来，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惇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肯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年罗惇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惇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惇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可进，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